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黄绍伦/著 张秀莉/译 李培德/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移民企业家

——香港和上海工业家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黄绍伦/著 张秀莉/译 李培德/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移民企业家

——香港的上海工业家



B12884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黄绍伦著;张秀莉译;
李培德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2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607—6

I. 移... II. ①黄...②张...③李... III. ①工业经济—
经济史—香港 ②上海市—移民—历史—香港 IV. F429.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081 号

Wong Siu - 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本书据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重印本译出

上海史研究译丛

移民企业家

——香港的上海工业家

黄绍伦 著

张秀莉 译

李培德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1 $\frac{14}{18}$ 插页 5 字数 217,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ISBN 7—5325—3607—6

K·545 定价: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 张晓敏 吕 健

本书责任编辑: 郑明宝

美术编辑: 黄 琛

技术编辑: 富 强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谥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丛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丛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丛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序 言

这部书描写的是一群控制香港棉纺织业的上海企业家。1975年,我正在牛津完成关于东南亚华侨的经济企业的学士学位论文,并且将要回港执教时,我的导师——已故的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一次关于我研究计划的讨论中向我提出这一建议。随着对学士学位论文研究的逻辑扩展,这一研究课题立即吸引了我。此外,上海人的成功故事对于像我这样在香港工业化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有内在的吸引力。弗里德曼教授在他的论文《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有过如下论述:“香港的(学生)和海外华人懂得中国的工商业在中国政体结构以外实现繁荣的方法,加上来自经济学家友好的推动作用,或许可以成功地描述中国的企业家如何成功地经营他们的事业(这种描述当然不是枯燥的)和反映出推动或延缓中国经济革新的因素。”显然是基于这一信念,就在弗里德曼教授猝然谢世前不久,他热心地鼓励我申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研究资助,使我得以进行这项研究。

1978年夏,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三年后,我开始投入田野调查工作,当时也并非没有顾虑。但是,被调查者的真诚令我惊喜,也让我感到田野调查工作的愉快,并从中深受教益。对于那些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谢。我首先要特别感谢景复朗(Frank H. H. King)教授,他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为我写推荐信,对我的调查计划提出许多改进意见。我要感谢 Judy Kwok 小姐陪我进行调查及其为田野调查的顺利完成所做的贡献。感谢黎志胜先生利用他的商业经营

管理知识帮我处理和搜集公司的记录。我还要感谢程劳拉小姐(Miss Laura Cheung)、伯林达(Belinda Law)小姐、唐健生先生和吴阔来(Wu Kwok-lai)先生等给予我研究工作的帮助。

1979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博士论文研究的资助,暂离香港大学,到牛津大学威尔逊学院(Wolfson College)逗留三个学期,写作关于上海纺织企业家的博士论文。那一年我收获颇丰。我从我的导师米切尔(J. C. Mitchell)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他耐心而又坚决地告诫我决不能局限在田野调查的资料中而忽略更广泛的理论观点。我希望米切尔教授的精湛学问和学术精神启迪了我,并能体现在本书中。伊懋可(Mark Elvin)博士审阅了我论文的一部分,在与他令人鼓舞的交谈中,我获益匪浅。威尔逊学院的优美宁静、牛津的青青草地都让我感到心旷神怡,使我得以坚持度过那段致力于思考与写作的孤独日子。

完成这篇论文又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后,我进一步思考这个主题并写了几篇论文。但直到1985年我有幸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项资助,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我才有时间对论文进行全面修改。论文修改期间,我曾将草稿交给一些学者审阅,其中有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教授、韩格理(Gary G. Hamilton)教授、胡耀苏教授、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我想对他们给予我论文的评价和鼓励表示感谢。1986年4月,手稿的某些部分曾作为论文提交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我非常感激卡尔格伦(Joyce K. Kallgren)教授和韩格理教授的邀请。最后,对于Hilda Chan女士、李格雷丝(Grace Li)女士、曹小慧小姐和钟庭耀先生为手稿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谨表谢忱。

1987年9月于香港大学



上海歹徒

——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

[美] 魏斐德/著 芮传明/译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日] 小浜正子/著 葛涛/译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

熊月之 马学强 晏可佳/选编

移民企业家

——香港和上海工业家

黄绍伦/著 张秀莉/译 李培德/校

上海道台研究

——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

梁元生/著 陈同/译

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刘建辉/著 甘慧杰/译

上海妓女

——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法] 安克强/著 (即出)

家乡、城市和国家

——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认同，1853-1937

[美] 顾德曼/著 (即出)

上海警察

[美] 魏斐德/著 (即出)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卢汉超/著 (即出)

人为的中国部族

——上海的苏北人，1850-1980

[美] 韩起澜/著 (即出)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引言：工业化与上海人	1
环境.....	2
上海人.....	3
上海人的职业特征.....	5
棉纺织工业.....	6
访问纺织家.....	8
上海人的飞地	10
第二章 精英人物的移民	14
离开中国	14
香港成为避难所	17
移民特点	21
移民方式	29
对主流社会的倾向	29
第三章 工业技术和资源	38
金融资源	38
银行贷款	44
利润的再投资	46

证券市场	49
生产资源	49
管理资源	56
市场资源	61
第四章 商业观念	72
社会责任感	74
理想的政治环境	79
协调和冲突	82
竞争与合作	85
自治和自主经营	86
利润分配	91
地域差异	92
第五章 地域主义和竞争策略	99
内部组织	102
外部交易	105
地位和权力	112
第六章 家庭主义和工业企业	121
企业内部组织	122
家长式统治	123
裙带关系	125
家族企业	132
工厂间的外部关系	142
第七章 结论	150
中国的工业企业家精神	150
种族集中	156
移民的类型	157
种族意识	159
种族冲突	163
局限和进一步研究	164
第八章 尾声	170
萧条(1980—1982)	170
中国的经济改革	171

目 录

中英谈判·····	172
参考文献·····	175
译后记·····	201

第一章

引言：工业化与上海人

在许多社会中，企业者精神与族源认同(Ethnicity)往往紧密相连。通常会发现具有相同血缘或地缘的人们聚集在特定的经济活动领域内。这就引起了诸如被描述为文化层面上的劳动分工、种族垄断或种族专业化等现象。这种现象的原型当然是欧洲的犹太商人。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大量类似犹太商人的群体，例如在哥伦比亚的 Antioqueno 工业家，尼日利亚的豪萨(Hausa)商人，孟买的巴斯(Parsi)和季雅拉蒂(Gujarati)织布工，伊朗的亚美尼亚(Armeniom)商人和纽约市的意大利房东。

在东南亚，“中国人”一词经常被看作商人和中间人的同义词。然而在这些海外华人自己看来，又有不同的“语群”或“亚族群”，他们有明显自己的职业分布。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曼谷，大部分米磨坊主是潮州人，锯木厂老板是海南人，皮革商店店主是客家人，机器商店的经营者是广东人。^①这种由地方群体组成的职业群体看起来具有中国本身传统城市经济的熟悉特征。仅举一例，据记录在 20 世纪初的杭州，“[实际上]所有的木匠、木雕工、油漆工、家具木工和卖药的都来自宁波，茶商、布商、盐商和旅馆老板来自安徽，瓷器商来自江西，贩卖鸦片者来自广东，酒商来自绍兴。”^②

香港本质上作为一个华人城市，这种职业聚集的模式也很明显。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群体中，无论从经济的重要性还是从集中的程度上看，最显著的要属纺织工业中的上海人。无论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官方对战后该地区经济表现的评价上，他们都占据突出的地位。在试图估算“香港在制造业几乎空白的情况下创造了巨大出口贸易额”时，布朗氏(E. H. Phelps Brown)强调了这样一个事

实“来自上海的资本、实践经验和事业心是香港初始发展的强心剂”。^③

这种分析已成为香港政府制订政策的基础。工商署于 1973 年拟定的工业用地的文件中,对上海企业家特别予以表彰。文件提到由于香港有幸得到“来自上海的实践经验和资本的注入”,使它比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提前“十到十五年”^④开始工业化进程,即使其他国家也获得了同样必要的经济投入。

然而,尽管上海人群体在香港的地位非常重要,但他们的故事仍未广为传诵。因此,此项研究的目的,即力图提供这个群体工业成就的详细解释,也填补我们对香港——一个在战后崛起的最繁荣的新兴工业区工业化过程的认识空白。希望关于上海纺织工业家的研究有助于回答两个理论问题:首先,为什么具有相同地缘的人们经常集中在特定的经济领域?其次,中国工业企业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鉴于这些问题,香港的上海纺织工业家的故事,先要从简单介绍他们从事经营的环境开始。

环 境

香港位于中国大陆南端的珠江口,面积 404 平方英里(按:1 英里=1.6093 公里),包括一个拥有腹地的半岛和几个岛屿。它的一部分在 19 世纪中叶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1843 年的《南京条约》中香港岛被迫割让给英国政府。1860 年,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另一次与西方列强的战争失败后,九龙半岛又被割让出去。到 1898 年,九龙半岛以北陆地的大片领土又被迫租借给英国。这块租借地其后被称为新界,租期到 1997 年。

由于香港是殖民地,公务员由位于层级结构上层的英国官员把持并受英王任命的总督管制。在香港政府的立法局和行政局有一些由总督任命“反映”民意的“非官方”成员。直到最近,这些非官方成员主要来自商业团体,显示了殖民地官员对工商业的关注。

英国统治开始后,香港成为重要的转口港。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经济角色由于两个重大事件发生了转变。1949 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使得大批内地居民涌到香港。香港人口从 1945 年的 60 万激增到 1951 年的 200 万。^⑤除了其他需要,必须为这些额外增加的居民提供工作。紧随着移民的涌入,朝鲜战争又爆发了。1951 年,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贸易封锁。这给主要依赖中国贸易的香港的商业活动以巨大的阻碍。为了

生存,殖民地必须寻找其他的谋生方式。因此,政府和商业团体开始把努力的目标转向工业生产。

其后香港工业化的骄人成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已成为这个地区最富有生产力的经济体之一。1980年,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24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位居第三。^⑥整个战后时期,香港一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除去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和朝鲜战争引起的短暂经济波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在1950和1960年代一直以每年10%的稳定速度增长。1970年代的前半期,经济增长率仍大约维持在8%,70年代末逐渐下降到略低于7%。^⑦

这种经济表现的实现,得力于香港为世界其他地区制造工业产品。制造业部门的产值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几乎有一半的香港劳动人口集中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主要为出口服务,1978年人均出口值达到2270美元。^⑧

上 海 人

如上所述,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来自上海人群体。这里“上海人”是指那些籍贯可以追溯到长江下游地区的“核心”地方的中国人。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他对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城市化进行研究时指出,19世纪的中国城市并未形成一个综合的、覆盖整个帝国的系统,而是形成几个联系松散的区域性系统。^⑨这些城市区域的边界与划分地理区域的主要分水岭相一致。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核心地区,通常是大河流域,汇集着各种各样的资源。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特征的产物,水路运输要比陆路运输便宜。因此,核心区域通过密集的运输网就可以区分出来,同时还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密切互动作用。

施坚雅将19世纪的中国划分为九个“大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长江下游区域,它覆盖肥沃江南地区和由钱塘江及其他流入杭州湾的河流所环绕形成的盆地。这个地区打破了行政的边界,地跨三省:即江苏省和安徽省南部,浙江省北部。^⑩这个核心区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制的地图上称为沪宁杭地区。“此为上海、南京、杭州和周边地区的统称。整体而言,它的范围向东延伸到上海,西到南京,北到长江南岸,南到杭州湾以南的宁波-绍兴平原。”^⑪这个区域之内,其经济与社会互动作用密切程度的象征,就是居民

都以吴语作为他们的交际语。^⑫

因此吴语区和长江下游城市中心地区的重叠,就可以作为界定上海人的界限。这一界限的显著性可以从这个地区的移民自愿组成联谊会的模式反映出来。1940年代,他们在香港组成地方联谊会,称之为苏浙旅港同乡会。^⑬后来,当两个新的组织出现,吸引了其中来自较小的地方的成员,它变成一个总会。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组成,成为补充前者的一个姊妹组织。^⑭十年以后,来自上海市的人特别组成了上海联谊会。

这三个联谊会的管理人员互相交叉。197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的十位顾问中,一位同时是苏浙旅港同乡会的终身会长,另一位是终身会董,其他六位是顾问。^⑮而三位苏浙旅港同乡会的常务会董又分别是上海联谊会的正副会长。^⑯

与此相反,来自苏北的移民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不同的领导者。朱介煊先生的讣告表明他逝世时正担任香港苏北同乡会和旅港江苏省同乡会的副会长,还是荃湾华北侨民福利会的副会董。然而他未在苏浙旅港同乡会担任任何职务的事实,这说明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地方团体,分别为来自江苏南部和北部的人。^⑰

就香港的上海人数量而言,苏浙旅港同乡会的会长估计1958年有350 000人。^⑱当笔者在1978年进行访问时,发现上海联谊会和宁波旅港同乡会的领导提供的数字分别是占总人口的10%和16%。

香港的人口普查不包含人的种族构成的具体信息,这显然由于部分官员认为这个人口统计的特点没有实际意义。唯一的例外是1961年的人口普查,关于族源认同的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来。居民要登记他的出生地、民族和籍贯。如果地理的边界与地方群体的划分没有出入的话,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正好适合目前研究的目的。由于人口普查过分关注来自广东的人,对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人都主观地归为一个整体,运用未分异的种类如“上海、台湾和中部沿海省份诸如浙江、福建和江苏”的划分。^⑲

据显示,全部人口的6%来自上述地区,^⑳但是有必要确定有多少人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福建或台湾。所幸统计包括居民常用的语言或方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讲上海话的总计69 523人,占总人口的3%。但这个数字不能包括所有的上海人,因为有些是在香港出生的,在日常讲话中可能已使用广东话。因此有必要列表统计那些讲广东话居民的籍贯,以此估计在本地出生的上海人数量。